

# 从主动投资到被动选择：农民工家庭在集镇购房的动因转变<sup>\*</sup>

刘 燕 叶敬忠 胡晓江

[摘要] 作者通过对重庆市阳县凤镇马村农民工家庭购房过程的质性研究发现，集镇优越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集镇的发展潜力、村庄内部带动和亲戚互助是促使农民工早期到集镇建房的主要原因。以集镇房子为关键因素的婚姻交换、村庄内部愈演愈烈的攀比、城乡公共资源“马太效应”，以及政府对到集镇购房的倡导和补贴，是后来农民工家庭到集镇购房的主要原因。从主动投资到被动选择，由争着在农村盖楼演变为抢着到集镇购房，这种大跃进式的城镇化和攀比式的集镇购房热带来了诸多的问题，这背后实际上离不开国家城镇化发展政策的推动和现代性与城市对乡村共同体的霸权。

[关键词] 农民工家庭 主动投资 被动选择 霸权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470 (2015) —04—0104 (06)

[作者] 刘 燕 硕士研究生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北京市 100875

叶敬忠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北京市 100094

胡晓江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北京市 100875

##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到2013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3.7%，与2010年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平均水平（52%）相当。农民工是城镇化的生力军和先锋队，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缘于农民工进城安家置业，各地小城镇竞相出现了农民工购房热。例如，在赣西一个仅三十余万人口的小县，2006年至2010年间，县辖区内的各个乡镇中，几乎每个乡镇墟市的居住类建设用地面积都扩大一倍以上，县城售出约7000套商品房，超过四成的购买者来自本县农村，多为农民工家庭。<sup>〔1〕</sup>重庆一些区县也出现农民工县城购房热，有的区县新增商品房的50%左右被他们购买，部分县城中高档楼盘50%至70%的住房被农民工购买。购房热能拉动地方经济增长，被地

方政府大力倡导。我们所调研的重庆市阳县凤镇马村某村民小组共有40户外出务工家庭，已有36户在集镇置业，尤其在近两年，到集镇购房更是成为热潮。与购房热遥相呼应的是高房价。近10年，无论是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还是默默无闻的中西部的集镇，房价都在持续上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4年到2013年，我国房价提高了228%。那么在房价一直处于高位上涨的情况下，收入勉强糊家的农民工家庭为何仍争抢着到集镇购房呢？

## 二、文献回顾

纵观现有研究文献，部分学者分析了农民工到小城镇购房的原因。为后代创造更优的成长和发展条件是每个家庭做决策的重要出发点，城镇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考虑到子女发展前途，只要有在务工城镇定居的能力，农民工就不会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村变迁研究”（编号：13ASH007）、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编号：11JZD026）的研究成果。

选择回家乡。<sup>[2]</sup>收入提高是农民工在城镇购房的基础,不同类型城市的房价高低有以下排序:超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县城>农村城镇,<sup>[3]</sup>目前农民工的收入虽有一定增加,有经济能力在城市定居的并不多,与大城市的房价相比支付能力依然很弱,而中小城市、小城镇住房均价低,进驻成本较低,成为不同层次农民工的首选。这与黄振华等对全国30个省267个村4980位农民的调查结果一致:在定居城镇的层级偏好上,县(县级市)成为农民进城定居的首选。<sup>[4]</sup>

除经济因素外,黄志辉发现诸如通婚、教育、地方性知识以及面子等一系列文化观念和象征“意义”是驱动农民去购置城镇房产的文化动因。在农村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调的背景下,农村男青年为了完婚而被迫迁移到城镇。<sup>[5]</sup>老家县城离家乡比较近,方便亲属之间的往来,具有相似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更容易找到归属感。<sup>[6]</sup>特别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倾向增强,其徘徊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在城市的时候怀念农村,在农村的时候怀念城市,选择县城,无疑是在大城市、乡村之间的一个折中选择。<sup>[7][8]</sup>潘华等也指出,新生代农民定居县城是“差序格局”感性化与家庭策略理性化的复合行为。<sup>[9]</sup>

国家和各地方政府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县级地方政府大搞房地产开发,为获得土地财政,县市级政府宣传农民进城购房就是投资,房价会持续上涨的神话,并给予按揭贷款和政策支持,甚至不允许农民在原农村宅基地上建新房、不允许农民维修旧房,逼他们进城购房,农民工的需求就被调动起来,纷纷到县城购房。<sup>[10]</sup>以土地国有化为杠杆,地方政府通过创办园区推进工业化,城市规划控制和区划调整加速推进城市化,吸引农民工到城镇购房。<sup>[11]</sup>但就政府是否应大力鼓励农民工到城镇购房,国内有学者提出异议。以贺雪峰为首的华中乡土派基于丰富的田野实践指出,当下广大农村家庭仍依靠“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维持生计,要保护农民返乡的权力。<sup>[12]</sup>国家和地方政府不能通过鼓励政策来推动农民进城,更不能通过推动资本下乡、土地流转、“四化同步”,以推动农民不可逆的进城。乡镇发展房地产,农民到乡镇购房子,既脱离农业,又无法从事工商业,如何住得下来?<sup>[13]</sup>

综观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以大样本实证调查为

主,“打算”和“愿意”的统计结果为主要依据。但“打算”和“愿意”一定程度建立在“空想”或“假设”上,不同农民工对此理解和认知不同;且意愿是一回事,能不能实现又是另外一回事。现有资料多停留于现状简单描述,不够深入,关注点为是否购房这一结果,很少对购房原因的专门和深入分析。此外,中国的经济状况、土地制度和传统文化等因素决定中国购房迁移的决策主体是家庭,现有研究往往只聚焦农民工个体。为弥补以上不足,我们从“事实”而非“意愿”出发,以家庭为基本分析单位探究已在城镇购房的农民工家庭的购房动因。

### 三、农民工家庭集镇购房原因分析

马村属于重庆市阳县凤镇,阳县是三峡库区重要枢纽,凤镇是阳县的江南重镇,辖20个村、4个社区、344个组、17060户、67889人。为打造城镇化示范镇,凤镇大兴土木,实行小区模式,已建成中高档小区5个,3个小场镇,多个新农村项目点。马村距凤镇有35分钟步行路程,我们于2014年1月与2014年3月先后前往进行调查,运用参与式观察,共完成普通农户家庭访谈30份、小组访谈1份、村干部访谈3份,以及5份非马村农户和7份城镇居民深度访谈,共涉及留守老人36人(男性21人,女性15人)、留守妇女5人、留守儿童5人、未外出打工中青年4人、春节返乡农民工24人。此外,我们还对2名凤镇房地产销售员、2名建材老板、1名返乡创业园区负责人和1名凤镇政府规建所负责人进行了访谈。我们所调查的村民小组共270人:常年在外打工的为中青年,有105人;居住在集镇的有140多人,多为老人陪读;村中常住人口25人,主要是留守老人。村民小组共40户,到2000年底38户都已住上了砖砌水泥楼房,截止调查日止已有36户<sup>①</sup>在城镇置业,早期(2002年~2008年)到集镇建房户共9户,后期(2008年至今)购房户共27户。

#### 1. 主动投资:早期集镇建房原因

9户建房户多是村民小组的“精英家庭”,在农村居住条件不错,经济水平较优越、文化水平较高、见世面较广,有些还拥有优越和丰富的社会资

<sup>①</sup>村民小组所有到集镇购房家庭都有外出务工所得作经济支撑,因此本文将各集镇购房的家庭都定义为农民工家庭。

源。2002年左右,村里就有人开始商量与几户较亲近的家庭一起购买地皮联合建房,通常是将地皮按照购买需求和能力划分,合资购买建筑材料,按日付费请建筑工人建房,统一完工,总费用据楼房大小和类型不同而有差异,但都在10万元以内。除2002年和2003年两户处于非中心地段建房外,其余都建在集镇中心地段。如今,这些人户在集镇得以安居,或开小作坊,或经营杂货店,或办台球娱乐场所,或卖建材,生计结构和经济来源稳定。而他们到集镇建房的原因与其经历、经济实力、见识、社会资源等因素关系密切。

#### (1) 集镇“条件好”,农村“条件差”

农村落后的经济、交通、医疗、教育现状等是驱使农民工家庭拼命“逃离”农村的最直接因素。集镇是片区的物流集散、商业往来、医疗教育中心,对周边乡村人口充满吸引力。

交通一直是农村发展的“老大难”。2000年,马村村集体修通了到集镇的机耕道,一定承载重量的拖拉机、货车和摩托车等可直达村内,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建筑材料和粮食运输难题。但由大雨导致的道路滑坡、道路被冲毁时有发生,车辆通行仍存在较大危险系数和不确定性。机耕道修通前,村民盖房运输砖头水泥、卖粮搬运粮食全靠人力,十分向往水泥路直达家门的集镇生活。每每到集镇赶集,村民需爬40分钟山路;若需到县城办事,需绕山路、坐轮渡,来回至少四天。

交通不便还导致组员就医难、上学难等问题。虽然集镇有中心卫生院,但当时乡间赤脚医生才是看病首选,医疗设备简陋、药物匮乏。63岁的马某于2006年在集镇建房,他、儿子和孙子都曾半夜犯过病,“1997年,儿子晚上突然发病,村里医生都没法医治,自己背着他爬山路往集镇卫生院送。他住院将近1个月,每日在集镇上买饭成本太高,就从家里送饭来,家里庄稼牲口也需要人照顾,没法只能一天来来回回跑好几趟,嘴边经常咸咸的,不知是汗还是泪。”1998年,马某孙子摔下山路受重伤,去市里医院医治后回到卫生院住一个多月。“还是像服侍他爸爸那样照顾他,每天奔波累死人,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出农村,哪怕砸锅卖铁、借钱都要到集镇住,造福后代。”

集镇拥有中心小学、初中和高中,村中只有小

学,且师资匮乏、教学质量差,成绩优秀的孩子念完三年级后便转校集镇中心小学,每日结伴起早摸黑爬山路走读,中午一餐经常饿肚子,条件艰苦,其余的孩子则留在村中念完小学。农村条件不如集镇在资源配置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 (2) 返乡投资

在“农村不如集镇好”的既定事实下,年轻男子拜师学艺再随人外出打工成为潮流,外出打工提高家庭经济水平的同时拓宽农民工见识,村中文化水平稍高、具有开创精神的60、70后的年青人意识到在外打工并非长久之计,开始思考如何返乡挣钱。恰逢1999年阳县新县城快速发展,凤镇集镇也随之开始规划楼房建设、整修道路;2005年9月,阳县长江大桥正式通车,从凤镇到阳县仅需20分钟,县镇经济往来增多。这让“开拓者们”看到了建筑行业的生财机会和搞小经营的潜力。

聂某,男,46岁,初中文化,家中四口人,儿子已重本大学毕业,女儿正在省内重本念书。聂家一直比较富庶,早在地主时期,其父便是地主家的主厨,后来聂某也是小组中外出打工的“先锋者”,有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当时在县政府上班的表哥透漏风声,说‘上面’要大力开发凤镇,政策支持会很多,早起来建房子卖肯定会赚。”所以,聂某从早些年夫妻俩在广东打工积蓄中拿出4.5万,拉上一帮熟人在集镇中心地段合建一整排楼房,自家得150平米4层楼房,3个门面。没多久,聂某家就将房子卖了出去,净赚30多万。2009年,聂家听亲戚说政府又会大力开发某一地段后又早早地在省道公路旁以低价购买地皮单建了120平米3层楼房,2个门市,后卖出2层楼房和1个门市,自家在门市上经营建材买卖,收入相当可观。

马某,男,63岁,年轻时是村内外有名的厨师,每逢红白喜事必被请去掌厨,大女儿已出嫁到县城,儿子20岁就开始外出打工,自己在县城一个工厂里当主厨每月能获得一定工资,家庭经济条件不错。2006年,马某在集镇农贸市场建120多平米7层楼房,2个门市。回忆起当初建楼过程,他既觉心酸又感骄傲,“建房总共花了10多万,开始钱不够,问亲戚借可他们都说我傻,说我的钱会打水漂,甚至还不愿意借给我,当时我就打赌说我不两年一定能还清账,最后看在我的面子和诚信

名声上才借钱给我。”“现在不仅还清账，还赚不少，大家都说我当时决定太明智，现在只靠出租房子得租金就能养活一大家子人”。

### (3) 村庄内部示范，亲戚互助带动

村中经济条件好，原本没考虑过到集镇建房的人户看到建房赚到钱便也开始到集镇建房；同姓大家族兄弟姐妹更是相互帮助，联合建房或相互帮衬单独建房。陈氏三兄弟于2007年到集镇联合建房，“能赚钱的事，只要有能力，谁不愿意做呢？”虽然逃离农村和进行投资是其主要动因，但组员的“示范”也起了极大的直接推动作用。

## 2. 被动选择：后期集镇购房原因

随着集镇建设事业的发展，集镇已有足够房屋销售，且建房成本越来越大、建设用地管理越发严格、竞争越发激烈，后来者想要在集镇建房经济门槛更高，所以他们选择直接购房。他们是村中外出务工大潮中的中流砥柱，外出务工时间平均在10年以上，购房偏好集镇中心地段楼盘的高楼套房，面积在100平方米~150平方米间。从2008年到2014年，集镇房价从700元左右一平米涨到3000元左右一平米，他们的房款主要由务工挣得，也有家庭先借钱购房再外出打工还钱。买房后，这批人户无法在集镇获得稳定经济收入安居，中青年只得继续外出打工，留守老人和小孩在集镇和农村“两栖”，每逢学生放假，集镇便空落不少。

### (1) “儿子要成家”：婚姻交换条件剧变

儿子置业成家向来是中国父母的任务。当下农村婚姻市场上，以“家庭地理位置”和“家庭经济条件”为分层标准，农村男青年已被划分为不同层级。从2001年开始，集镇住宅已成为当地婚姻交换的关键条件，“男方在集镇没房子就娶不到媳妇”，“女儿不嫁给没在集镇或者县城买房子的男人”。为此，第一代农民工会在城里打工直到无雇主愿意雇佣，拼命攒钱到集镇购房。

薛某，男，32岁，至今未婚，17岁开始前往广东打工，为人踏实肯干。父亲52岁，母亲53岁，都是勤劳朴实的农民，1999年春节后两人随儿子一同外出打工。2003年，薛某22岁，眼看到了该操心婚事的年龄。三人将后期打工积蓄和早年农耕存款凑在一起，回到农村，花了约7万在原农村老宅基础上盖起四层楼房，贴了瓷砖，看上去十

足洋气。厨房、客厅、浴室、卧室布局合理，彩电、冰箱等一应俱全，全家以为薛某能顺利成婚了。“好多媒人都来看了，觉得房子的确不错，但说女方嫌弃地理位置太差，不愿意嫁过来！我们真是太傻了，计划赶不上变化，谁能想到现在女子的条件这么高，我们这距离集镇也挺近，道路也挺方便，就因为是在农村，就不愿嫁过来，真真浪费了我们的血汗钱啊！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处理农村的新房了。”2006年，三人再次外出打工，“没办法，我们还是要拼命在集镇买房子娶媳妇用，我看这个日子真是不让农村人活了！”

为何农村婚姻交换条件会有如此大转变？打工潮大规模兴起后，农村女性婚姻资源减少，农村男青年对婚姻资源的争夺将日益激烈，为获得婚姻资源，他们必须付出更多代价。<sup>[14]</sup>同时，城市价值观和消费主义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农民工，尤其是乡土情结淡薄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择偶标准越来越高，女性更看中对方的经济和能力，在城镇有一套住房就成了衡量经济和能力的唯一指标。本质上，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后代缺乏农耕技术和经验，无法从土地上获得经济来源，他们也不再愿意回到农村，家长不得不为无法靠农业谋生的后代在集镇购置新房，以期后代能在长远的将来在集镇谋得非农收入。

### (2) 涌向集镇：村庄内部攀比

外出打工改变了村中原有贫富秩序，原本就存在的攀比较量愈发激烈。同时，早期到集镇建房赚钱不仅有带动作用，也导致无形压力，固守农村逐渐被认为是“懒”和“不争气”，年轻人不得不在集镇置业。

王某，男，今年36岁，继承了父亲在原供销社的工作，按月领工资，大家都对他家铁饭碗羡慕不已。供销社被撤后，夫妻俩去广东打工，生活十分节俭，舍不得乱花一分钱。儿子今年28岁，20岁开始打工，22岁在广东与务工时相识的一位河南籍女子结婚，二人现有一个五岁儿子和二岁女儿，日子还算安稳。王某家并未在村落大院里，而在距离集镇中心不到一刻钟的地方，但他们从2008年就着手计划在县城或集镇购房，“大院子的家长都在集镇给娃娃买了房子，我家还住在老地方，虽然够宽敞，但楼层低、位置差，别人看着笑

话”。2013年回家过年，夫妻拿出毕生积蓄，儿子儿媳出4万，四处奔走借了4万，凑齐32万后，在集镇上最豪华、高档的新区里购买了110平米套房。“现在院落里有能力到新区买房子的人不多吧，但我就可以办到。虽说凑钱不容易，但这个房子都是有钱人才住得起。欠的钱，平时节约点，多吃点苦，过几年就还了。”正月十二，王某留在家里照看孙子孙女，妻子、儿子、儿媳全外出为还债奔波。

(3) 公共资源的“马太效应”：集镇更好，农村更差

短短十年时间，如今的集镇基础设施俱备、高楼住房林立、商场超市鳞次栉比、娱乐场所齐全、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也得到提高，而农村依然泥泞小路、公路几近荒废，“虽总传言国家会修缮农村公路却始终未见落实，没有盼头”，农村和集镇条件差距增大。

此外，国家和地方政府撤点并校相关政策的实施迫使村民早早地便要到集镇陪读。据小组长讲述，“2007年，村小被撤除。撤除前，各家会让孩子在村小读完两年幼儿园和三年小学，再到集镇中心小学念书，那时孩子每天走读也安全，家长也放心，到初中孩子就可以住读了。拆除后，读幼儿园都得到镇上读，孩子那么小，大人必须到集镇陪读。”陪读就得在集镇租房，租房又非长远之计。32岁的陈某于2009回到集镇购房，他说：“集镇读书条件好，从幼儿园一口气读到高中，考上大学就继续读，不然就出去打工。租房不是长久之计，说到底还是要买房。”

在政府大力支持下，集镇卫生院于2008年扩建，占地已达14000平方米，这提高了卫生院在农民心中的地位，新农村合作医疗补贴也使村民更乐于到卫生院就医报销。李某，男，43岁，“现在到卫生院看病国家才给报销，在乡里不管花多少钱，全自己贴。屋里老人和小孩常生病，以往一直在乡里看病，现在国家给补贴了，就到卫生院来。没想到住院一个月成了家常便饭，医院渐渐成了第二个家（无奈地笑起来），来来回回实在不方便，年轻人拼死打工也要在集镇上给父母和孩子买套房子住”。

(4) 政策拉力：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进城“红利”

农民变市民，是重庆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农宅变楼房，则是农民变市民的重要象征。从2008

年开始，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其中重要的政策标志是“重庆地票交易与千万农民进城计划”。地票交易和千万农民进城计划的实质是农民放弃宅基地换取城镇户口和相关社保体系以及一定的现金补偿。对于农民工家庭来说，常年外出打工，造成农宅闲置、土地撂荒，再加上地方干部的“宏伟描述”，进城成为了一种不错的选择。为了坚定农民进城的决心，地方政府还会出台各种配套的诱导政策，例如高山移民搬迁补贴等扶贫政策，危房补贴等惠民政策。

农民进城之后首先需要解决的当然是住房问题。与此同时，伴随重庆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是地方房地产行业的井喷式发展。以阳县凤镇为例，自2008年被确定为市级重点中心镇以来，这个场镇面积不足0.8平方公里的集镇，几十幢高、中、低档楼房如雨后春笋般地快速涌现，房价也从最初不到700元每平方米涨到现在的近3000元每平方米。镇政府则对当地房地产发展大开政策绿灯，对一些违法兴建也选择性地沉默。于是，农村的地没了，城镇户口有了，集镇楼房是现成的，加上政府和地产商大力的宣传，大量外出农民工涌入集镇买房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 四、乡村还是城镇，农宅还是高楼

城镇化是农村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追求更体面的生活也是每个公民和家庭的自由权利，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大跃进式的城镇化和攀比式的集镇购房热也带来了诸多的问题。一方面，房地产主导的城镇化是一种低质量的城镇化，相关产业发展不足，公共服务不能配套，居住在高楼里的农民还只是农民，买房的农民工仍就只能常年外出务工，以至出现了“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在城里睡觉；平时在外打工，过年回来小住”的怪像。另外一方面，这种出于无奈的集镇购房给许多普通农民工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经济压力，辛辛苦苦外出务工挣来的血汗钱换来不能经常居住的空楼，同时势必还会影响家庭的教育、医疗投资，从长远来看，这是一种得不偿失的选择。

那么，农民工家庭到集镇置业会逐渐从主动投资演化成被动选择，深究其原因，这与政府倡导的现

代主义和发展主义不无关系。政府高举现代主义和发展主义的旗帜，以城镇为中心，为实现经济增长，“致力于”消灭传统的、多元化的农村习惯、实践和关系。农村与集镇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上的差距一直存在，现今却与日俱增。基于农民外出务工使农村家庭收入水平提高的“统计学事实”，政府利用其对政策法令的绝对权威，通过资源城乡配置，实施以实现教育集约化和城市化为宗旨的农村撤点并校政策，给无法在大城市安居的农民工家庭制造出到集镇购房的需求。孩子“不得不”到距离农村老家较远的“中心学校”就读，抚养人“不得不”到集镇陪读，农民工家庭“不得不”到集镇购房。制造出这一刚性需求后，农村宅基地复垦或搬迁到集镇得补贴，则是政府使用的直接利益“诱惑”。购房已成“必需”，政府补贴成为香饽饽，农民工家庭想要获得补贴，争先恐后到集镇购房。同时，现代样式的道路、楼房与内部装潢等因外显性与可衡量性强而在官吏升迁的政绩考评中占据主要地位，这些现代化硬件通常被地方各级政府官员理解为“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为实现自己的政绩投资，政府通过对收入的再分配，倚重集镇建设，高楼拔地而起，高档消费广场鳞次栉比。<sup>[15]</sup>而农村的基础条件未得到改善，农民的真正需求被忽视，农村越发寂寥和萧条，越来越“容不下人”。政府以城镇为中心的发展政策利用“不得不”和“诱惑”不断侵略和冲击农村，处于夹缝中的农民工家庭被迫到集镇购房，成为“城里人”。<sup>[16]</sup>村庄内部带动、跟风和攀比一直存在，婚姻交换条件也随着社会发展在变更，但以往其表现形式是争着在农村盖“洋房”或“小楼”，而如今演变为争抢到集镇购房，这也与城镇化、工业化倡导的物质文明不无关系。

在国家和政府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政策以及以城市文化为中心的现代性夹击下，农民工家庭不得不做出到城镇购房的激进决策。但当农民工真正从农民变成居民，从农宅住进高楼之后，生存压力的加重和生活节奏的紧张、彷徨逐渐推翻国家描绘出的城镇舒适和幸福的蓝图，但昔日家园早已回不去。这让我们不禁引人深思：农民工进城、农村城镇化，请适当放慢进步，量力而行。

#### 参考文献：

[1] 黄志辉，李 飞. 非经济动力——农民工“住城”

的文化动因 [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3）.

[2] 章 铮. 进城定居还是回乡发展：民工迁移决策的生命周期分析 [J]. 中国农村经济，2006，（07）.

[3] 周建华，周 倩. 高房价背景下农民工留城定居意愿及其政策含义 [J]. 经济体制改革，2014，（01）.

[4] 黄振华，万 丹. 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及其特征分析——基于全国30个省267个村4980位农民的调查 [J]. 经济学家，2013，（11）.

[5] 栗志强. 农村青年婚姻市场层级化的社会学分析 [J]. 当代青年研究，2013，（03）.

[6] 汪永涛.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 [J]. 南方人口，2013，（01）.

[7] 申端锋. 从大都市到小县城：80后农民工返乡的一个途径 [J]. 学习与实践，2009，（03）.

[8] 汪俊玲.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房奴”的困境 [J]. 学术评论，2013，（05）.

[9] 潘 华，卓 瑛. 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变奏：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行为研究 [J]. 兰州学刊，2010，（05）.

[10] 贺雪峰. 警惕县城过度开发变“鬼城” [J]. 文史博览（理论），2014，（03）.

[11] 蔡继明，王 栋，程世勇. 政府主导型与农民自主型城市化模式比较 [J]. 经济学动态，2012，（05）.

[12] 贺雪峰. 保护农民返乡的权利 [J]. 文史博览（理论），2013，（12）.

[13] 贺雪峰. 反对积极城市化战略 [N]. 南方周末，2008-05-14.

[14] 田先红. 碰撞与徘徊：打工潮背景下农村青年婚姻流动的变迁——以鄂西南山区坪村为例 [J]. 青年研究，2009，（02）.

[15] 曹锦清. 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 [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16] 叶敬忠. 一分耕耘未必有一分收获——当农民双脚站在市场经济之中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1）.

责任编辑：杨建伟  
校 对：